

## 第參章 十九世紀俄國男性視角下之「新女性」

### 第一節 「新女性」之出現

十九世紀後半兩性平等意識從西歐傳入俄國社會，但將女性問題搬上抬面的卻是一群男性知識份子，他們肯定女性教育之必要，呼籲女性追求經濟獨立，並勇敢表達自己的想法。所有受其影響，擺脫俄國傳統特質之女性便被稱為「新女性」。

#### 壹、男性知識份子之推動

克里米亞戰爭(Крымская война, 1853-1856)失利為俄國歷史上相當重要的轉捩點。戰敗不僅使俄國失去歐洲強權地位，還造成俄國社會人心惶惶。戰敗等同宣告俄國近百年改革一敗塗地。大受打擊的貴族及知識份子開始檢討俄國經濟、政治及社會弊病。原本穩固社會秩序的封建、宗教及宗法三大制度受到質疑，部分知識份子否定現存價值觀與世界觀，知識份子重新檢視傳統價值的客觀性與公平性。女性問題也因此躍上抬面，女性地位與兩性關係成為六〇年代最主要的火熱問題 (Burning Questions) 之一。<sup>58</sup>

首位提倡女性教育的男性知識份子為身兼外科醫生與教育家的尼古拉·皮拉哥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Пирогов, 1810-1881)，他主張只要接受良好教育訓練，女性便能展現出不遜於男性的能力。他在其一篇名為〈生活問題〉(Вопросы жизни)的文章寫道：「如果女性接受適當的教育與教養，她可以讓自己成為藝術家、科學家，她的社會意識也會像男性一樣高度發展。」<sup>59</sup> 克里米亞戰爭其間，皮拉哥夫曾訓練一批女護士上前線，為

<sup>58</sup> Stites, Richard.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Feminism, Nihilism, and Bolshevism 1860-1930*. New Jersey: Princeton UP, 1978, p. 30.

<sup>59</sup> Успенская, Валентина. *Мужские ответы на же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19 в.- первая треть 20 в. Антология. Том 1*. Тверь Феминист-пресс, 2005. с. 31.

傷者治療。女性的勇敢與溫柔撫慰許多傷兵的心靈，此訓練成果證明女性能力不但不遜於男性，反而擁有驚人成效。<sup>60</sup> 除皮拉哥夫外，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德米特里·皮薩列夫(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Писарев, 1840-1868)公開反對俄國傳統女性教育，他指出任何有限制或預定目的之教育方式(傳統女性教育的目的只爲了培育出賢妻良母)都應廢止。當男性知識份子頻頻爲女性發聲後，俄國第一位女性經濟學家瑪麗亞·薇爾娜茨卡婭(Мар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 Вернадская, 1831-1860)從經濟面出發，鼓勵女性追求經濟獨立。她認爲女性獨立的先決條件爲放棄妻子及母親角色。唯有透過自己的雙手工作賺錢才能掙脫男權社會之束縛。經濟獨立，女性才能不依賴男性，才能完全獲得解放。皮拉哥夫、皮薩列夫與薇爾娜茨卡婭皆爲致力女性問題，使性別議題受到社會矚目之推手，但歸納整合俄國女性問題，喚醒女性自我意識的最大功臣爲作家米哈伊爾·米哈伊勒夫(Михаил Ларионович Михайлов, 1829-1865)。

十九世紀法國有兩位著名的反女性主義者：米什萊(Jules Michelet, 1798~1874)及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他們認爲女性肉體較男性虛弱，且長期忍受經期與懷孕之苦，無法擔任重要的社會角色。他們強調女性的家庭角色，主張養育小孩與服侍丈夫爲女性天生職責。俄國保守派份子承襲此觀點，反對女性走出家庭。米哈伊勒夫針對這些評論一一做出反駁。他承認女性體格的確比男性嬌小虛弱，但科學足以彌補這項缺點，「拿槍的女人可以殺死拿斧頭的男人」(A woman with a gun could kill a man with an axe)乃是女性可透過科學戰勝男性之最好證明。<sup>61</sup> 從古至今未曾出現女莎士比亞、女荷馬等名作家並非代表女性智力與創造力不如男性，米哈伊勒夫認爲創造力必須以豐富的生活經驗爲基礎，透過觀察世界與接觸生命，人類才能創造出不朽之作。然而，女性長久與外界隔絕，如同被矇眼搗耳地生活在世界上，當然無法創造出好作品。除此之外，米哈伊勒夫認爲女性所有弱點皆起因於缺少健全教育，女性如果能和男性一樣，接受正常之教育訓練，其心智發展程度絕對不能同日而喻。米哈伊勒夫爲第一位提出男女合校概念的人，他主張加強兩性之間的認識能減少因

---

<sup>60</sup> Stites, Richard. op. cit., p. 30-32.

<sup>61</sup> Stites, Richard.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Feminism, Nihilism, and Bolshevism 1860-1930*. New Jersey: Princeton UP. 1978, p. 42.

幻想而造成的不幸婚姻。男女雙方如有相似的社會地位、成長背景、學識涵養與興趣，其相處必定和睦，離婚率也會降低。<sup>62</sup> 米哈伊勒夫對女性的觀點客觀公正，具說服力。加上他頻發表期刊文章闡述理念，很快地引起社會迴響。然而，一八五九年米哈伊勒夫發表的〈致年輕一輩〉(К молодому поколению)一文使他被判流放，並於西伯利亞病逝。革命烈士的身份讓激進份子更加支持米哈伊勒夫的理念，解放女性也列入革命運動之主要目標。

## 貳、第一代「新女性」

喬治桑「新女性」形象之影響力襲捲俄國學術界，皮拉哥夫、皮薩列夫、米哈伊勒夫等男性知識份子的推動與倡導，少數女性開始藉由經濟獨立擺脫男性控制，抑或藉由高等教育提升社會地位。不顧世俗眼光，勇敢實現理想，或追求「自由的愛」。符合上述任一項特點之俄國女性皆被稱為「新女性」。屠格涅夫《前夜》(Накануне, 1860)中的依蓮娜·尼古拉耶芙娜·斯塔霍娃(Еле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Стахова)便是追求自由的愛之「新女性」代表。依蓮娜與一般俄國婦女不同，她擁有異常堅定的心靈與自我原則。

軟弱使她(依蓮娜)反感，愚昧令她憤怒，而欺騙，則是“從永遠到永遠”她都無法饒恕的；她的嚴格超乎一切，甚至在祈禱時，她也不只一次地夾雜著斥責。一個人一旦不再受她尊敬—她下判斷十分迅速，甚至往往過於迅速—那個人在她心裡就永遠不存在了。所有的印象全都深深地沈入她的心底，人生對於她，是絕不同於兒戲的。

63

她寧願跟隨一個貧窮，但純潔的保加利亞人英沙羅夫(Дмитрий Никанорович Инсаров)，也不願嫁給富裕，膚淺的貴族子弟。當她勇敢地向英沙羅夫告白後，兩人私定終身，決定一起回保加利亞為解放理想奮鬥。即使英沙羅夫因病去世，依蓮娜仍決定回保加利亞替丈夫實現願望，她遠赴戰場從事護士工作並「永遠地、永不復回地消逝了」。(Тургенев, 1971:

<sup>62</sup> Успенская, с. 46-63.

<sup>63</sup> Тургенев, И. *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 Накануне, Отцы и дет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1: с. 351.

現實生活中「新女性」的代表人物為俄國第一位女醫生蘇斯洛娃( Надежда Прокофьевна Сулова, 1843-1918)、第一位提倡俄國女性解放運動的絲達索娃(Надежда Васильевна Стасова, 1822-1895)與其他靠自己雙手工作，追求經濟獨立的城市女工。專門研究俄國婦女史的美國學者李查·史戴特斯(Richard Stites)將革命前熱衷女性解放問題，為女性利益發聲之「新女性」分為三個流派：女性主義者(feminist)、虛無主義者(nihilist)與激進份子(radical)。三派的目標與成員各有不同，但她們對於十九世紀後半的婦女解放運動皆奉獻出一己之力。

女性主義者主要成員為中上階層或貴族之女，她們無意參與革命或採取激烈手段，僅致力於成立慈善基金會，以實際行動救濟貧困女工。為了提供女性正當聚會場所，她們在各大城市成立女子社團。女性主義者最大的貢獻為推動女性教育，第貳章提及的星期天學校與為了大學教育奮鬥之女性團體皆為女性主義者所領導。

虛無主義為六〇年代特有名詞，此派女性以改變社會本質，追求真正的兩性平等為最終目標。為了模糊男女刻板印象界線，虛無主義女性效法喬治桑剪去長髮、脫下襯裙，換上褲子、戴上眼鏡，叼著雪茄，徹底除去身上所有女性特質。屠格涅夫《父與子》中的葉夫多克西雅·尼基契希娜·庫克希娜(Авдотья Евдоксия Кукшина)夫人為最具代表性的「新女性」原型。這位解放女性(émancipée)一出場便給予讀者邋邋、骯髒等意象，開口閉口不離科學之行爲，暴露其膚淺及知識貧乏。屠格涅夫以「葉夫多克西雅用她那被煙草薰成棕色的手指捲好一支煙，用舌頭舔了舔，吸了吸，然後才點燃它抽了起來」<sup>64</sup>醜化女性抽煙形象，描述她醉到大唱吉普賽歌曲，加強「新女性」的可笑形象。儘管皮薩列夫批評屠格涅夫不懂虛無主義本質，屠格涅夫也表示自己無意諷刺虛無主義者。庫克希娜夫人還是成為保守派知識份子公認的「新女性」形象。

---

<sup>64</sup> Тургенев, И. С.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Том седьмой.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81: с. 65.

激進份子對改革則不抱任何希望，這些激進的「新女性」和男性一起暗中宣傳革命意識。她們認為所有社會問題皆源於階級壓迫，唯有推翻沙皇政府與階級制度，女性、農民與所有受壓迫的階級才能獲得解放。激進份子到八〇、九〇年代多成為民粹主義者，或馬克思社會主義者。她們從事地下工作，對中下階級人民進行思想改造。此派女性與男性激進份子一起致力於推翻俄國沙皇政府與封建制度。屠格涅夫《處女地》(Новь, 1877)中的瑪麗安娜(Марианна Викентьевна Синецкая)便屬此派「新女性」。與庫克希娜夫人不同，屠格涅夫沒有使用任何負面字詞形容瑪麗安娜。在《父與子》中，屠格涅夫透過其他角色稱讚庫克希娜為「了不起的人物」(замечательная натура)反諷她裝腔作勢之「新女性」形象。在《處女地》中，西皮亞金夫人(Валентина Михайловна Сипягина)對瑪麗安娜之批評卻突顯瑪麗安娜對挫折之忍耐力與其對理想之執著。瑪麗安娜甚至展現出比男主角涅日達諾夫(Алекс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Нежданов)更驚人的勇氣。當慫恿農民革命的活動失敗後，涅日達諾夫開始懷疑自己的信仰時，瑪麗安娜卻仍堅持己見：

「以前我認為，我相信我的事業，我只是懷疑我自己，懷疑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能力，我認為我的才能跟不上我的信仰……不過現在看來，這兩者是分不開的——那為什麼要欺騙自己！不——我不相信這個事業。瑪麗安娜，你相信嗎？」

瑪麗安娜直起身子，抬起了頭。「是的，阿歷克賽，我相信。我整個身心都相信，並且我要把我的一生全都獻給這個事業，直到最後一息！」。<sup>65</sup>

三派的「新女性」對彼此雖有不滿，但同樣都是為女性同胞的利益奮鬥。當時不少年輕女性為逃離男權家庭限制與管教而到大城市獨自謀生。她們寧願在大城市裡過困苦生活，也不願回到傳統家庭受箝制。然而，城市女工薪資低廉，每天工作時數長達十四小時，加上城市房租昂貴，數百

---

<sup>65</sup> Тургенев, И. С. *Дым, Новь*.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0: с. 427-428.

位女工只能勉強住在工廠小廠房，生活品質十分惡劣。許多女工爲了維持城市生活不得不出賣靈肉賺取金錢，妓女數量大增，性病散播以及女工經濟困境皆阻礙女性解放運動發展，「新女性」因此受到社會批評與鄙視。除了三派「新女性」爲了改善女工情況想盡辦法，不少贊同女性解放的男性知識份子也絞盡腦汁，爲女性問題付諸一己之力，尤其以新一代的青年知識份子最支持女性解放運動。

## 第二節 社會對「新女性」的論述

社會輿論對「新女性」的看法有眾多分歧，其中以虛無主義者最擁護「新女性」。於此同時，保守派與西化派的紛爭日益激烈，與女性相關的種種社會問題成爲他們爭論之戰場。

### 壹、虛無主義(нигилизм)與《怎麼辦？》(Что делать?)

虛無主義並非正式信仰或有系統之主義，它乃是俄國一八五〇、六〇年代盛行於某些群體間的集體道德觀、思想或體系。虛無主義思想早在五〇年代便露出端倪，但社會大眾普遍使用虛無主義一詞，始於一八六二年屠格涅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 1818-1883)出版之《父與子》(Отцы и дети, 1862)。主人翁巴札洛夫(Евгений Васильев Базаров)爲否定所有秩序，包括社會制度與自然法則的新一代知識份子，屠格涅夫雖誇張地描述男主角否定一切的偏激個性，但巴札洛夫質疑社會既有規範之特質確實體現了虛無主義精神。此書出版後，所有新一代反對傳統制度之知識份子皆被稱爲虛無主義者，其代表人物包括皮薩列夫、達布拉柳波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Добролюбов, 1836-1861)與車爾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828-1889)。根據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列夫·介瞿(Ле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Дейч, 1855-1941)定義之虛無主義爲：

虛無主義欲透過清除風俗阻礙、呼籲人們反對所有非理性觀念與偏見、拒絕接受權威或任何類似力量等方式，建構無任何區別之全人

類平等。<sup>66</sup>

除了拒絕接受一般社會大眾認知之藝術觀與道德觀，否定現存社會機制外，虛無主義者認為，藉由提升個人良知，改善社會之過程太過緩慢，糾正俄國社會必須採取更激烈的改革方式。<sup>67</sup> 正因虛無主義者否定傳統男權社會機制與追求全人類平等，束縛俄國女性之傳統規範自然也被視為不合理現象。許多虛無主義者還藉著女性議題論述傳統秩序之不公與荒謬。不少女性也因此加入虛無主義者行列，即「虛無主義女性」(нигилистки)。

車爾尼雪夫斯基於一八六三年出版之《怎麼辦？》(Что делать?, 1863)助長虛無主義思想之普及與流行。車爾尼雪夫斯基為十九世紀著名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與小說家，其作品《怎麼辦？》的藝術價值雖不大，但此書對當代之影響力絕對勝過托爾斯泰、杜斯托也夫斯基及契訶夫等名作家。與屠格涅夫、托爾斯泰不同，車爾尼雪夫斯基非專職作家。作家大多在創作中顯露兩性觀或婦女觀，車爾尼雪夫斯基卻是為了表達其兩性觀而創造作品。早在五〇年代車爾尼雪夫斯基便相當關注女性議題。一八五三年，他曾發表過一篇文章，主張男女教育水平差距太大，以致於社會無法判定男女是否有天生差異。女性教育水平低落造成外界無法瞭解女性的天生特質或內在想法。除了男權社會賦予女性的傳統特質外，女性本身根本不知道自己擁有何種特質，或是何謂自我意識。<sup>68</sup> 因此，車爾尼雪夫斯基欲創造一位可供俄國婦女學習之「新女性」典範。透過這位虛構「新女性」的啟發，女性應可挖掘出女性特質與潛力，在新世界中找到應有的尊重與自由。車爾尼雪夫斯基便是抱持這項理念創作出《怎麼辦？》這本轟動俄國社會的小說。

《怎麼辦？》提供讀者新的世界觀與道德觀，即「新人」(новые люди)之生活形態。女主角薇拉·帕夫勒夫娜(Вера Павловна)在書中展現出不願屈服於任何人堅強意志，包括母親與愛情。

---

<sup>66</sup> Stites, op. cit, p. 100.

<sup>67</sup> Tompkins, Stuart Ramsay.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Makers of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57, p. 40-43.

<sup>68</sup>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Г. Заметки о женщинах. //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16*.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39, с. 281.

我不願意屈從於任何人，我要自己是自由的，不必對任何人承擔什麼義務，我要讓沒有人敢對我說：你有義務為我做什麼樣的事情！我只想做我願意做的事情，也希望別人都能這樣做；我無求於任何人，也不願意限制任何人的自由，總之，我想做個自由的人。<sup>69</sup>

當德米特里·謝爾格伊奇·洛普霍夫(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Лопухов)以假結婚方式，將薇拉從男權家庭中解救出來後，她仍舊不願妥協，對他提出種種要求與規定。薇拉知道權力關係建築於金錢上，當「一個女人靠男人養活的時候，她就得依附於他」(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939: 89)。因此，她開設自己的縫紉工廠，不願依賴丈夫過活。她甚至提出分房概念，要求空間上的獨立與自由。此小說涵蓋許多俄國「新女性」面臨的社會困境，但不論是假結婚、兩性平等、女性獨立或是三角戀情等問題在小說中都獲得完滿結束。

虛無主義者將此書視為聖經，虛無主義女性更將女主角薇拉·帕夫勒夫娜(Вера Павловна)當作理想典範。許多女性仿效薇拉·帕夫勒夫娜，利用假結婚，逃離父權家庭束縛，<sup>70</sup>譬如女數學家卡娃列夫斯卡婭(Софья Васильевна Ковалевская, 1850-1891)便是藉由假結婚逃到國外，與偽丈夫之關係又相敬如賓，最後真心相愛結合。然而，假結婚帶來不少負面影響。大部分藉由假結婚脫離傳統家庭與男權社會束縛之女性都不能如願過著幸福的日子。假婚禮結束後，男女雙方各自生活，各自找尋愛人，卻因此衍生出私生子問題。除此之外，部分男性婚後反悔，要求女方履行妻子義務，強迫她必須共同生活。因此，大部分利用假結婚脫離家庭之女性都未能如預期般自由生活。還有女性因丈夫未能履行《怎麼辦？》中夫妻平等的生活條約而逃離家庭，兒童文學作家瑪依柯娃(Екатерина Павловна Майкова, 1836-1920)便為此離開丈夫馬伊科夫(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айков, 1826-1885)。儘管如此，《怎麼辦？》還是描繪出新一輩知識份子未來的藍圖，其中兩性相處模式、工廠經營模式與女工們的合作社生活等皆讓青年知識份子對新社會充滿希望與期待，激進派革命份子也將此書立為綱領。

<sup>69</sup>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11.* Москва: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39, с. 32.

<sup>70</sup> 當時已婚婦女必須持有丈夫同意證明才能自出國或在國內旅行。



如果說女性主義者將爭取女性教育與工作機會視為最終目標，虛無主義女性便是將兩性間真正的平等當作目標，包括教育、工作、婚姻，甚至擇偶與性生活都必須絕對平等。她們期望所有俄國女性打從內心反抗男權社會，認同自己心靈獨立。六三年至六五年間，一群虛無主義女性推行「性及個人自由平等運動」(Movement for sexual and personal freedom and equality)，號召「新女性」告別父母、丈夫、小孩，加入合作社過著共產生活。參加「新女性」繳出個人所得，她們用基金過共產生活。彼得堡許多貴族、中下階層女性及牧師女兒都參加了類似活動。<sup>71</sup>除了共同生活，虛無主義女性認為婚姻關係持續的前提為愛情存在與否。換言之，愛情結束的同時，婚姻關係也必須隨之結束，男女雙方都有權另尋他人。虛無主義女性拒絕單一伴侶，但這並非表示她們性關係混亂，虛無主義女性仍舊反對濫交、賣淫與通姦行爲。

保守派份子卻誤解虛無主義女性的兩性觀，認為她們提倡隨便的性關係。虛無主義女性模糊男女界線，偽裝成男人的中性打扮被批為邈邈，互助之共產生活被疑為淫亂的男女同居，拒絕終身單一性伴侶被控為雜交。一八六六年，亞歷山大二世下令逮捕虛無主義女性份子，質問她們是否和男性同居、雜交。散佈謠言說她們爲了資助革命團體，出賣肉體。連出國學醫都被認為是爲了幫彼此墮胎。批評家史特拉厚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трахов, 1828-1896)公開批評出社會工作的女性。他表示自己痛恨西化派知識份子老將生活瑣事擴大成哲學問題，而且總是從國外引進解決方法，女性問題是此種荒謬現象之一。史特拉厚夫除了以俄國女性擁有財產權反駁女性解放之必要性，更提出女性出外工作將會降低女性結婚意願的說法。時事評論家卡特寇夫(Михаил Никифорович Катков, 1818-1887)堅持女性教育之目的乃是訓練全職的妻子與母親，女醫生或其他領域之女性專家根本沒有存在必要，甚至表示「我們不能允許女性教育問題在國內造成話題，尤其這僅是一群短髮女性之要求。」<sup>72</sup>不僅保守派份子歧視虛無主義女性，連許多贊同女性運動或同情傳統女性之知識份子也將虛無主義女性當成笑柄，譬如屠格涅夫《父與子》中裝腔作勢的庫克希娜夫人(Авдотья

---

<sup>71</sup> Stites, Richard. *Women and Russian Intelligentsia// Women in Russia. California: Stanford UP, 1977, p. 41.*

<sup>72</sup> Stites, Richard.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Feminism, Nihilism, and Bolshevism 1860-1930. New Jersey: Princeton UP. 1978, p. 78.*

Евдоксия Кукшина)便是諷刺虛無主義女性的最佳例子。其他如皮謝姆斯基(Алексей Феофилактович Писемский, 1820-1881)、列斯科夫(Николай Семенович Лесков, 1831-1895)與岡察洛夫(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ончаров, 1812-1891)等作家都曾在小說中諷刺虛無主義女性。<sup>73</sup>

一八六六年的虛無主義追捕行動，虛無主義思想領袖皮薩列夫過世，加上許多虛無主義者加入民粹主義或其他革命團體，虛無主義逐漸勢微，並從俄國舞台上消失，但其思想及理念皆傳承保留下來，甚至更為激烈，譬如虛無主義女性之兩性觀到後來演變成二十世紀初的薩寧主義(Санинизм)與一九二〇年代的杯水主義(Теория стакана воды)，本論文第肆章會再詳細介紹。

## 貳、女性困境與社會批評

兩性平等意識高漲使俄國知識份子正視女性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包括婚姻暴力、經濟困境、不斷生育與被迫賣淫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保守派與西化派皆表達自己的立場與意見。

### 一、婚姻

東正教傳入俄國後，經過上帝認可與祝福的婚姻儀式才算合法，婚姻制度神聖化，但儘管女性婚後受到慘不人道的待遇，卻無法獲得神的救贖。這種夫妻間權力不平等之情形持續至十九世紀仍舊存在。農村婦女大多在十六歲左右嫁為人婦，婚後女性立即陷入不斷懷孕的悲劇之中。農村的高流產率、嬰兒死亡率與分娩後併發症使許多婦女患有精神疾病，即「歇斯底里」症。男權社會賦予丈夫虐待、毆打妻子的權力，加上丈夫背叛、冷落妻子，不少農村婦女被迫謀殺丈夫，以求解脫。受過教育的中上階層女性情形雖較農村婦女好，但與丈夫教育水平不同，溝通困難，加上性生活不協調使婚姻生活充滿紛爭。儘管婚姻制度造成許多悲慘的命運，曾受上帝祝福的夫妻關係卻不能輕易結束。離婚在沙皇時期雖然合法，卻十分罕

---

<sup>73</sup> Stites, *op. cit.*, p. 111.

見，通姦為政府唯一受理的離婚條件，但申請人除了必須找到證人證明另一半與他人私通，冗長的公開程序不僅花費許多金錢，還有損家族名聲。有能力訴請離婚的貴族不願公開通姦事實，不在乎名聲的中下階層卻無足夠財力負擔訴訟費用。因此，大部分不幸夫妻都無法離婚，造成許多社會問題。

十九世紀後半，性別平等議題與「新女性」意識高漲，批評質疑傳統兩性關係與婚姻制度的聲浪隨之而起。為了穩定婚姻制度，一八八八年沙皇政府出版名為《沈浸在喜悅與悲傷的婚姻生活》(Family life in Its Joys and Sorrows, 1888)的宣傳手冊，書中讚揚俄國傳統宗法制的的生活方式，批評西方將所有女性都變成妓女之思維模式。<sup>74</sup> 保守派知識份子斥責所有走出家庭追求自我實現的女性，女性應在家相夫教子，安守本分。甚至以譏諷嘲笑的态度看待所有「新女性」。托爾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1828-1910)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家庭幸福》(Семейное счастье, 1859)中強調結婚對女性的重要性。書中描述少女瑪莎(Маша)是如何在男主角謝爾蓋·米哈伊雷奇(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ыч)的誘導下，從膚淺的少女轉變為成熟的母親。瑪莎完全沒有個性，也沒有自己的理想，只是乖乖地遵循長輩指示與建議，她的作息方式、說話模式，甚至穿衣打扮都按照謝爾蓋的期望與喜好：

我原本的習慣和趣味他多半不喜歡，只要他眉毛一揚或眼珠一轉，表示他不愛聽我要說的話，只要他露出獨有的不屑一顧的神色，我立刻就不再喜歡以前喜歡的東西。有時他剛要對我作什麼勸告，我立刻就知道他要對我說什麼。當他盯住我的眼睛問我什麼事情時，他的目光就能從我的心裡勾出他所要的思想。當時我所有的思想和當時我所有的感情都不是我自己的，而是他的思想和感情突然變成我的思想和感情，潛入我的生活中，並且把它照亮。<sup>75</sup>

即使婚後夫妻倆感情不再，托爾斯泰仍強調維持婚姻關係之重要性。

---

<sup>74</sup> Stites, Richard. *Women and Russian Intelligentsia// Women in Russia. California: Stanford UP, 1977, p. 43.*

<sup>75</sup> Толстой Л. 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22 томах. Том третий.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9, с. 84.*

他認為愛情並非婚姻的必要條件，即使愛情消逝了，家庭幸福卻仍舊存在。如同瑪莎所說：

我和我丈夫的戀愛關係結束了。舊的感情變成一種寶貴的、一去不返的往事，而愛孩子和愛孩子父親的新感情奠定了一種嶄新的幸福生活的基礎，這種生活現在還在繼續著……。(Толстой, 1979: 150)

## 二、經濟

除婚姻外，經濟問題同樣為「新女性」所面臨的困境。儘管女工生活困苦，女工數量卻在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與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大量增加。戰爭把男性逼上前線，工廠運作全靠女工。由於女工薪資比男工少三分之一，也比當時提出勞工運動的男工溫和許多，許多雇主樂於雇用女工。一八八七年的女工人數從原本的十九萬兩千人，增加到一九一四年的七十二萬三千人。城市女工原本經濟狀況就不佳，女工數量增加使經濟情況惡化。一個月十五到二十盧布的薪資僅能勉強餬口。受過高等教育的中上階層女性情況也相差無幾，儘管她們受過專業職業訓練，社會大眾卻無法信任女醫生、女律師或女技術員。十九世紀作家庫普林(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Куприн, 1870-1938)的短篇小說〈求職的姑娘〉(Просительница, 1895)便是以失業女性為主題。女主角列麗婭(Леля)不僅找不到工作，還受到男性要求其當情婦的羞辱。

這幾個月來，她接連遭到痛苦的失望：臨時工到處找不到；工作總是粥少僧多；職位都有人佔著，儘管她準備拼命幹，那怕幹得累倒，但就是沒有活兒。今天，最後一線希望也成了泡影。確實，列麗婭已習慣遭到拒絕了，但她還從來沒有受人侮辱過。<sup>76</sup>

找不到工作的女性只能勉強在地區中小學教書，有些則投入全職的革命運動，因為社會完全沒有她們的容身之處。

---

<sup>76</sup> 庫普林。《阿列霞》。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頁 35。

### 三、孤兒及墮胎

「新女性」呼籲女性同胞追求自由的愛，鼓勵女性勇敢表達自己的情感，挑戰社會秩序，卻造成私通關係盛行。中上階層的女性為愛犧牲，寧為情婦。中下階層女性只能靠性交維持生活，不願出賣肉體滿足男廠長的女性根本無法保住工作。不合常規的性關係造成私生子數量大增。中上階層女性為了名聲無法留住小孩，中下階層女性則是由於經濟困境不得不將小孩丟棄於街上。一八八四年至一八九二年間，一萬人當中約有二百六十八人為私生子。<sup>77</sup> 沙皇政府為解決棄嬰與孤兒問題成立孤兒之家，照顧街上無助兒童。然而，由於資源不足與經濟困境，孤兒死亡率仍高達百分之七十五。

孤兒院的確稍稍改善孤兒情形，但墮胎與避孕才是確實減少孤兒數量之手段。墮胎在十九世紀末乃是非法行為，女性只能找私醫墮胎。許多婦科醫生指出非法墮胎的氾濫與其危險性。一九一四年一群犯罪學家、律師、醫生與警察於彼得堡召開討論大會，<sup>78</sup> 許多學者要求墮胎合法化。他們認為禁止墮胎對貧困賣淫的未婚女性十分不公平。宣導避孕措施不僅能降低嬰兒數量，還能使女性脫離不斷懷孕的惡夢。儘管專家學者肯定墮胎與避孕的好處，政府還是以道德理由否定他們的提議。保守派份子認為避孕使女性卸下母親職責，讓毫無節制的性行為合法化，墮胎更違背神要求人類傳宗接代的旨意。托爾斯泰《克洛采奏鳴曲》(Крейцерова соната, 1889) 中的波茲德內歇夫便責備醫生幫助其妻子避孕。卸下母親職責的妻子在他眼裡如同四處勾引男人的花蝴蝶。他對妻子的猜忌導致最後殺妻之不幸結果。對保守派份子而言，東正教歌頌的傳統女性才是理想典範，母性與處女貞節乃是最珍貴的女性特質。女性應安份地擔任妻子與母親角色。他們認為俄國女性不需要受高等教育，其他女性解放運動也不應該存在。

### 四、娼妓

除了上述種種問題外，娼妓問題也是十九世紀末最受社會矚目的議題

---

<sup>77</sup> Stites, *op. cit.*, 1978, p. 179.

<sup>78</sup> *Ibid.* p. 181.

之一。一八八九年，聖彼得堡急速工業化，城市工人需求量大增，一時間湧進上百萬男女勞工。有限的工作機會與微薄的薪資使大部分城市女工陷入經濟困境。除了一天工作十四個鐘頭與惡劣的工作環境，女工低廉的薪資根本無法負擔房租，她們不是幾百人睡在廠房中，便是居無定所。不少城市女工只能出賣肉體，維持城市生活。庫普林在《雅瑪街》(Яма, 1915)中便描述娼妓無止盡的悲慘生活。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她們在妓院閨房裡過著離奇古怪的生活，無休無止；她們被社會所遺棄，蒙受家庭的詛咒，身為城市淫慾的發洩器，家庭名譽的維護者——這四百個不能生育的愚蠢、懶惰、歇斯底里的女人。<sup>79</sup>

娼妓數量暴增，性病傳播引起男性恐慌。保守派知識份子藉此機會大肆批評女性，他們不僅否定女性的社會功能與價值，更將娼妓問題歸咎於女性淫蕩之天性。甚至有心理學家斷定女性賣淫、墮胎及殺嬰行為皆起因於失控女性的焦慮(anxieties of uncontrolled women)<sup>80</sup>，以專家身份宣判這些女性患有先天性精神疾病，必須加以管束治療。然而，也有男性知識份子，譬如達布拉柳波夫，反因娼妓問題，更強調女性教育之必要性，他主張唯有提高女性道德教育與擴展女性謀生能力才能降低娼妓數量。

一八五〇、六〇年代，支持女性運動的男性知識份子以女性問題作為階級壓迫的代表，他們以男女權力關係闡釋地主與農奴之間之不平等關係，這也是男性知識份子為何重視女性議題最主要的原因。十九世紀末，民粹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份子改變方針，將所有社會問題皆歸咎於階級制度，男性知識份子的焦點便漸漸從女性轉向農工階級。他們認為只要推翻舊有封建階級制度便能解決所有壓迫問題與不平等關係，男性不再關心女性議題也不再插手干涉女性解放運動。自此之後，女性解放運動將由新一代的女性主義者接手，她們將以女性之角度重新定義「新女性」形象，為了全面性的男女平等奮鬥。

<sup>79</sup> 庫普林·亞歷山大。《雅瑪街》。北京：九州出版社，2000，頁4。

<sup>80</sup> Engel, B. A. *Transformation versus Tradition. // Russia's Women: Accommodation, Resistance, Transform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 143.

總括來說，所有害怕傳統社會兩性相處模式產生變化的保守派人士皆反對女性解放運動，包括政府官僚、反西化的斯拉夫派、教會，還有地主、商人、中產階級，甚至農民。中上階層害怕失去固有權力，中產階級害怕社會不安造成經濟動盪，農民則害怕生活情況每況愈下。十九世紀後半的社會結構改變雖引起保守人士恐慌，但不論他們如何反對，女性自我意識已經萌芽，傳統法規與社會批評再也無法壓抑女性對自由與權利的渴望。